

资本逻辑的意义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张有奎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资本逻辑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和物的逻辑, 它在文化上, 一方面摧毁传统文化的价值, 另一方面造成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意象。文化的超越性表现在它不是物质生产的消极附属物, 而是力求摆脱物的束缚, 追求某种理想性的存在。强调文化的超越性不同于文化决定论的立场, 也就是说,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化拯救的限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祛除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 实现它的现代转化。它的历史使命在于遏制资本逻辑的泛化, 重构人民的精神家园, 开拓人类新文明的样式。

[关键词] 资本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唯物史观 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5)09-0046-04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5.09.009

资本的铁笼似乎把现代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挟持了, 陷落在笼中的现代人蜕变为经济动物。然而, 资本逻辑的自洽性难题及其历史性呈现的结局预示新文明样式的出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 还在于为开拓新文明样式提供文化资源。

一、资本逻辑及其文化意义

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 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原则, 而且广泛渗透到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 成为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考量标准和主导原则, 表现为功利主义的流行。脱离资本逻辑的内在运作机制, 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面相。

资本逻辑具有诸多的向度, 从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 它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也就是说, 它遵循的原则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 而不是人的价值及其实现。资本几乎具有内在的生命, 成为主体性的存在, 而人却仅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中介。现实的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 即按照理性的、自利的、最大化的原则比较、判断、思考、决策。从资本运动的性质来看, 它是

物的逻辑, 而不是人的逻辑。由于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分离, 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 并且人的价值必须通过物的价值的实现才能得到体现,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 物的逻辑支配人的逻辑的局面。从哲学层面的特征来看, 它是同质化的逻辑。交换价值把一切商品的质的差别抹平了, 商品之间只有量的差别。一切存在物都形式化和抽象化了, 世界也被理解为可以机械计算和切割的对象性存在。形而上学构成资本逻辑的哲学基础。

资本逻辑是历史的产物, 它造成物质财富的几何级数增长和万物商品化。它在文化上, 一方面, 摧毁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传统文化是适应于前现代社会的精神成果, 随着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确立, 前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就西方而言, 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文化固然在自由、平等、民主方面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 进而在精神世界的世俗化方面遭到诟病, 但前现代的封建等级文化和贵族精神是不可能恢复了, 不论人们把这视为进步抑或精神堕落, 那些与农业文明相匹配的文化形式不可能被教条地继承,

张有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它们也难以适应现代资本逻辑的文明样式。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维度。时代性是纵向的历史维度,这一维度上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前现代文化一样过时了,不再适应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商业文明。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前现代和现代之间存在根本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局部的枝节性的调整,而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置换。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学说之间也有互相批判和借鉴,如儒家和道家的互相批判、道家和墨家的互相批判、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互相批判、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互相批判、原子论和理念论的互相批判等,但它们总不是问题域的转换,常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前现代和现代之间却是不同文明时代和等级之间的转变与批判,那些适合于前现代的文化,很难适合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因而统统作为过时的东西,归于历史档案馆。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如语言、习俗、传统等,它们从来不是固态的存在,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也有迁移和湮灭,民族性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因而永远不会溶解于某种同质性的资本之硫酸。西方中心主义借口时代性取消民族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无疑具有片面性。

另一方面,它造成现代文化的平面化和工业化。资本逻辑刺激人的感性欲望,躲避崇高、神圣、理想、意义等传统的精神诉求,力求把天上的王国拉低到和地上的王国同样的水平。整个世界不再有高低之分,统一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文化不是区别于经济的另一个世界,而是经济之工业化的表达。文化的工业化表现为文化变成一种娱乐化的商品,一种与其他商品并没有实质性差别的供给品,它满足和迎合大众的低俗口味,而不是引导他们的价值观,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文化的存在价值变为可以量化计算的东西。文化的高贵性没有了,一切都世俗化了,到处蔓延着虚无主义的文化意象。资本是绝对的主人,它深深印在文化工业品生产者的心灵之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讽刺性地指出:“文化工业的进步,还离不开资本之普遍法则的根源。”^[1]他们批判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认为文化工业

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破坏了真正的娱乐,混同于广告的生产流水线,瓦解了人们的真实情感和反抗意识,从而认同了资本的绝对权力。

二、文化的超越性及其限度

超越性与现实性的张力关系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超越性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种是西方式的超越,另一种是东方式的超越。西方式的超越源自柏拉图,它力求挣脱有限、经验、感性、相对的束缚,达到对无限、超验、本质、绝对、永恒、神圣、上帝等的把握。对这种超越而言,真理与正义的法则是从上而下的道路,感性经验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抽象化和形式化是西方式超越的基本特征。东方式的超越则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为代表,它力求挣脱当下和自我有限的感性生命之束缚,但不是向上的无限求索和先验设定,而是偏重自身生命存在的历史追溯和社会场景,不论是对祖先的崇拜还是对日常伦理的重视,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独特超越之路。两种不同的超越性表达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文化与人的超越性不是外在的粘连,而是内在一体的关系。这里的文化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狭义文化。文化不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或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而是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生命样式。文化的超越性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它是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和家园。失去超越性的文化看上去是一种文化,实质上仅是具有文化的外壳,或者说是一种伪文化。阿道尔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在资本逻辑的腐蚀下,已经堕落为文化工业,成为社会水泥,表面上繁荣,实际上扼杀人的个性和自主性,灌输给人们一种消费主义观念,人失去灵性的生活,成为资本原则的牺牲品。

文化的超越性屈服于资本主义现实性的逻辑,即完全被市场原则所支配,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尽管有其历史根由,但它是超越性的突破原则底线的妥协,如同完全忽视现实性的硬性法则而片面强调天上的珍宝一样,都是割裂超越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导致的恶果。我们并不想遭到道德浪漫主义的指控,因而也绝没有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纯粹精神动

因而不顾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这一文化精神变迁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如果把一切社会现象的变革统统归结为物质生产方式的消极附属因素,尤其是忽视精神文化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就有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危险。经济决定论仅仅看到经济的决定性意义,完全不顾历史主体的积极作用,因而历史变成在人之外的客观进程,似乎我们只需惊愕地看着并消极地顺从历史的方向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共产主义。这就陷入了客观历史主义的陷阱。

文化的超越性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根由。从实践层面看,文化的超越性是一个经验事实,而不是杜撰出来的假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它源自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对立,人的理性能力和整体把握世界的欲求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本真存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生存法则不是人的唯一法则,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不是个体的最高法则。正因如此,才凸显人的高贵和伟大。文化的超越性不拘泥于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物的逻辑,追求真理、人的自由和纯粹的情感体验,这是人的多维性之体现。

马克思从不否定文化的超越性之存在。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无视德国的经济现实和德国哲学之间的联系,因而陷入纯粹的空谈和苍白的呐喊,但如果就此走向另一极端,把精神性的存在视为纯粹物质动因的消极产物,也是同样错误的。马克思本人极为强调物质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他的时代和社会氛围过于强调精神性因素的独立性。我们切不可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不重视文化和传统,不重视精神因素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极有文化素养和文化精神的人。

现代文化的超越性之根本意义在于,一是维持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运行。资本逻辑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法则,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消极意义在于导致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人的手段和目的的颠倒。恪守文化的超越性意味着把资本逻辑限定在经济领域范围之内,从而使得现代社会良性运行。二是拯救文化自身的精神生命。资本逻辑泛化的恶果是文化的堕落和被阉割为工业之宦官。文化的超越性力求提升人的精神生

命,使文化不会成为被资本绑架的傀儡。三是文化的超越性是人之希望所在。人的堕落在于屈服于资本逻辑,失去人的个性与尊严。文化的超越性力求使得人的生活重归人的灵性生活,而不仅仅是肉体的存活。

现代文化之超越性的限度在于,它要受到现代实践水平和生产力状况的制约,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制约。当实践水平尚没有达到工业阶段的时候,现代文明超越传统文明就是不可能的。同样道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阶段,现代文明的样式被超越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认识不到这一点,片面强调文化的超越性,就有陷入浪漫主义的嫌疑。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同意文化决定论的立场。

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及其历史使命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是必然的历史过程。传统文化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样式,文化保守主义站在传统时代的角度,拒绝与时俱进,原教旨主义式地坚持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立场,批判现代文化的弊端,完全忽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无视实践的革命性变革,从纯粹文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演进,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者,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者。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僵化的固态的存在,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的演变而变动。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激烈碰撞,内在地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的历史使命不在于传统文化的自我合法性的确证,而在于发挥文化的超越性功能,寻求解决当今时代重大问题的出路。

其一,遏制资本逻辑的泛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重义轻利。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效率原则本身并没有错,就此而言,传统的“轻利”原则在今天的经济领域已经行不通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亦有规则和秩序,不能按照丛林法则做事。见利忘义、没有道德底线、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对“义”的淡漠恰是今天中国市场领域的普遍现象,就此显现出“重义”的重要性。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重视对道的追求,认为君子是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超越,反对经济原则对精神领域的统治和支配,认为重利轻义是小人的行为。换句话说,经济与文化是有张力的存在,不能用经济原则吞并文化原则。贝尔说:“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况。……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2]我们固然不同意贝尔关于社会领域划分的说法,不同意他把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看作三个彼此完全独立的领域,但贝尔的观点对于我们反对经济决定论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资本逻辑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发挥传统文化的超越性功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其二,重构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是人们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关键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3]面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们试图重新建构道德理想并把握现实。贝尔认为西方社会的出路在于“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4]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贝尔的看法未免浪漫化,其积极意义在于从传统寻求精神资源。精神家园的建造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

其三,为开拓人类新文明的样式提供文化资源。现代文明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它以人为的秩序取代自然的秩序,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它以物与物的关系表征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人的全面异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和”的文化,强调的是

天人合一的关系。海德格尔曾经钻研老子的《道德经》,试图从中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药方。尽管他最终放弃了,但他的努力表明,吸收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文明样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具有亲缘关系。当然,这不是拒斥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也不是要向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不是复古主义。放弃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而完全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以图现代化的幻想,乃是糟糕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有学者阐发了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理解线索:它不是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具有特定性质与内容的社会主义文明;它不仅仅以具有抽象人格的“原子个人”为原则来建立整个文明的决定性基础,而且将更为根本地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集体”或“社会”整合到其全部建制的基础之中;由于它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能够在占有这一文明之成果的同时,使自身从由资本逻辑而来的“进步强制”中解放出来,并对整个现代技术采取自由态度;等等。^[5]

无论如何,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和历史使命,切不可陷入道德浪漫主义的陷阱,必须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美学的救赎固然听上去很美,却没有现实性,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欺骗色彩。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价值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BKS112)、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内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2YJA72003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译者:渠敬东,曹卫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8.
- [2][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1-42,75.
-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 [5]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J].中国社会科学,2012(5).